



晚清古文研究

WANQING GUWEN YANJIU

——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
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

柳春蕊 著

丛书策划：张国功
责任编辑：张国功
封面设计：刘永强
版式设计：张国功

ISBN 978-7-80742-272-3



9 787807 422723 >

定价：29.80 元

晚清古文研究

WANQING GUWEN YANJIU

——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
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

柳春蕊 著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 / 柳春蕊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10

(灯下学术文丛)

ISBN 978-7-80742-272-3

I. 晚... II. 柳... III. 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1763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lhz@bhzw.com

书 名 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

作 者 柳春蕊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南昌市民营科技园民营大道 69 号

开 本 1/32 880mm×1230mm

印 张 13.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ISBN 978-7-80742-272-3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刘世南

我素来持论：善论析者必善创作。早年的北大，黄节（晦闻）讲诗，其《蕙葭楼诗》即妙绝一世；林纾（琴南）讲古文，其《畏庐文集》亦脍炙人口。

柳磬如君早几年出版诗文集，还曾要我作了序。现录出如下：

予夙好藏书，四部之精者略备。“文革”一炬，尽化坑灰，遂不复购书，亦不复游书肆，惟日坐校图书馆之样本书库，以自医其固陋。沉潜既久，见今人所著书多游谈无根，华而不实，怒然忧之。

柳君磬如，方负笈北大为博士研究生，知世人多如原伯鲁之不悦学，亦以为大忧。爰自力于诗古文辞，斐然有述作志。客岁夏，以胡君迎建之介来访，议论风发，多可听。自后每至章门，辄枉顾，语娓娓如故交。别后辄寄所编《北社》等杂志来，征文考献，为绝学于举世不为之日，即此羽翼学术之盛心，已足以立根于而舒枝叶，延斯道于垂绝也。

予素喜与少年之英杰者游，如支道人爱马之神骏。矧柳君挟用世之资，际风云之会，方如巨鹏之徙于南溟，其水击风从云垂海立之状，将使伏草莽者悚息踟立而莫敢仰视焉，则其诗文之中

弼而外彪可知矣！

今柳君辑其诗古文辞，将以寿世，而问序于予。予年在衰暮，行能无似，何足以知君？惟是山谷遗音，几辈堪称法嗣；桐城逸躅，于今尚有典型。君能继之，滋可喜已！

夫学问之道无穷，善为文者，奥旨能申明，使晓畅而超迈；工于诗者，风流每自得，感悱恻以缠绵。君春秋鼎盛，又复伏案功深，则其所诣之高远，宁有涯涘耶？予盖跂而望之矣。

此序作于2004年8月29日，距今两年多了。看了这篇序，读者对柳君之善诗文，必定毫无疑义。那么，面对着《晚清古文研究》这部大书，想起“善论析者必善创作”这句话，来一个逆定理，也就知道柳君这部专著将给读者们带来多少深沉之思啊！

柳君要我为这部专著作序，原因是我们有同好：都喜欢研究清人的诗文。他看了拙著《清诗流派史》，又看了刘松来教授和我合作的《清文选》，认为我虽非于此三折肱，但也算略识个中甘苦了，所以引为同调。

我著书和为文，坚持“毋剿说，毋雷同”，一定要“古所未有，后不可无”（顾炎武语）。柳君著书原则，和我完全一样。《晚清古文研究》一书，以韩柳古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潜在写作背景，分析晚清古文由陷于困境而终于消亡的主客观原因，论析得非常细致、深刻。作者通过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和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分析其内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指出其走向衰亡的必然性，也是凿凿有据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提出了许多新说，如对梅曾亮“因时”理论的剖析，对“归有光现象”和“声音现象”的探索，都给读者以新的解释。作者之所以能这样辨析入微，正是因为他取精用宏，目光四射，古今中

外,尽赴腕底,供其驱遣。其附注之多、阐述之精,处处展示着作者的博学。新见迭出,胜义络绎,充分证明作者在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理论的运用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从12月13日起,到同月20日止,我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仔细研读柳君此书,不禁发出无限的感慨。

首先想到的,是我国的古文必然为语体文所取代。这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文学也必然由贵族而走向平民。韩欧的古文革新,是在封建文化圈子里进行自我调整,而新文化与新文学,则是平民的。这和古文有质的不同,所以,晚清古文,无论吴汝纶、郭嵩焘、薛福成等如何上下求索,也找不到一条出路。一句话,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有现代化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而古文作为实用工具,已经成为古董,只有历史文物的观赏与考证价值了。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他们的学术论著,如果像胡适一样,用大白话来写,多么痛快!我是读了一辈子古书的人,自己也应人之请,偶尔写写古文,可我就力主学术文的写作,应走胡适、朱自清、闻一多他们的道路:深入浅出,明白如话,说理明彻。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样佶屈聱牙、古香古色,叫读者读起来云遮雾罩,甚至猜谜呢?学术文的说理,不同于美文的抒情,后者需要含蓄、暗示、言在此而意在彼,以便激活读者的思维能力,扩大读者的想象空间。说理文基本上没这个必要。这一点,柳君和我的看法相同,此书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其次,古文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久已是已陈刍狗,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它?正如柳君在此书“结语”中所说:“将韩柳古文运动、欧阳修古文革新、胡适之等人的新文学运动,放在中国文学通变的大视阈中,放在与中国文学进程的‘事’、‘物’当中来看,其精神是相通的。”研究晚清古文,正是为了具体了解这种相通的精神。过去了的并非全

部死亡,它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即以古文而论,一个现代的人,无论他是作家还是普通读者,传统文化修养的有无和深浅,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他的人生取向和价值观,不过他不一定自觉而已。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太多的课题等待我们去发掘、研究并总结,问题是要学有根底、博览群书,而又好为深沉之思的人才去从事这份工作。“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八十三岁的我,只有把满腔的热望,寄托在柳君这辈中青年学人身上。

是为序。

2006年12月20日写于江西师大大螺居

目 录

序	刘世南 1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1
第二节 问题与方法	7
第一章 从新城到桐城——陈用光与嘉道时期的古文实践	20
第一节 经世古文家陈用光	21
第二节 吴德旋——桐城古文进入江浙的中介	36
第三节 古文视野中的新城与桐城	53
第二章 梅曾亮与桐城派古文在京师的传播	73
第一节 作为姚门弟子的梅曾亮	74
第二节 “孔门四科”中的文学——道与文的剥离	85
第三节 桐城派古文在京师的传播	100
第四节 京师古文圈子的复杂性	114
第五节 “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	123
第三章 都下古文中的归有光现象	140
第一节 吴敏树进京与《归震川文别钞》	140
第二节 归有光影响下的古文家创作分析	161
第三节 日常伦理作为一种叙事对象	174
第四章 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上)	190
第一节 曾国藩的“别调”与京师古文圈子的偏离	191

第二节 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及其开展的内在逻辑	197
第三节 曾国藩的气性与其古文思想之关系	219
第四节 写作学意义上的古文理论	249
第五章 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下)	260
第一节 咸同时期湖南士人的古文与事功	261
第二节 因声求气:晚清古文理论中的声音现象	292
第六章 吴汝纶与清末古文教育	320
第一节 甲午战争之前的吴汝纶	320
第二节 莲池书院与以吴汝纶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 ...	343
第三节 新式学堂的兴起与旧学中的古文教育	367
结语	396
主要参考文献	404

绪 论

嘉道以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剧。随着西潮的兴起,传统书院改为新式学堂,科举制废除,白话文盛行,古文遭受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面临着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題。这样,凡与古文相关的概念和命题都被重新提出来,遭到挑战和怀疑。古文家此时的心态,所作出的回应,古文自身所呈现出来的面貌,等等,这一切构成了晚清社会进程中一幅颇为丰富的历史画卷。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本书研究对象为“晚清古文”。“晚清”这一概念,学术界说法不一。大多认为等同于中国历史上的“近代”,即1840年至1911年或1840年至1919年。上限是鸦片战争,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端,也是西方文化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的开端。下限有两种,一是辛亥革命,这种划分主要出于史学的考虑;一是五四运动的开始,这种划分出于文化史的研究,跨越了清末至民国的政治分野,更多注意到了中国文

化的近代性。^①

研究此一时期思想和学术史的学者常用“晚清”这一概念,是基于思想学术史内在演变的事实,将“晚清”上限断在嘉道之际,下限为五四运动。^②另外,像当代美国学者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将“晚清”界定为1800年至1911年。^③这样做,更多关注的是学术史内在的逻辑,使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历史事件决定论、影响论的思维框架。

鉴于本书研究的是古文,因而在处理“晚清”这一概念时便面临

① 文学史上的“近代”多采用此分期。另外,据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一书统计,又有1894—1919、1898—1919、1902—1919、1840—1919、1820—1929年等不同分期。(《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页534,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此外,王飏、袁进、关爱和《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一文谈到“近代文学始于明末”说,并以周作人《新文学的源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例进行说明(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页4—23)。

② 比如上海古籍社出版《晚清学术书系》就采用这种分期法,其中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即为典型。其他如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谢世诚《晚清:道光、咸丰、同治朝吏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第三十九期油印本,1950)、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陈平原与王德威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意国际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熊月之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李允俊主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等,大都将晚清上限划到嘉道。

③ 费氏该书“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一章分析了清帝国版图中的新疆、蒙古、满洲、西藏等四个地区在1800年前后发生的各种社会变化。在“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一章中,集中论述了1800年前后中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在费氏等人看来,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社会落伍最为重要的内因,外族入侵只是对这一社会危机的加剧。从1800年中国社会各种现象来看,建立在儒学基础之上的“旧秩序”已失去了有效的社会调治功能。这是费氏将晚清上限断在1800年的重要依据。(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着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古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不可能在纯粹的时间概念上来对其进行讨论；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从价值论上对古文进行归纳、选择，无疑又会遗漏甚至割裂在那一时代曾经真实存在着的丰富性与完整性，从而也无法真正地理解晚清古文的具体情景。因而，本书界定“晚清”这一概念时，采取折中的办法。一方面，这一时段的古文有较强的时代色彩，文学题材和所表达的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不少关心民瘼疾苦，反映社会现实，赞颂人民英雄精神和民族气节的篇章，故而将中国历史上的“近代”这一时间观念作为重要参照系；另一方面，这一时段的古文现象又与此前的古文有着内在一致性。古文在其发展中形成了自身固有的特点，加上各地区学术传统不相同，导致古文发展的不平衡，因而这一时段的古文现象异常复杂，古文发展与时代并不同步，甚至其固有传统会反过来作用于时代及其进程。

1815年，姚鼐在江宁书院去世，1903年吴汝纶在家乡桐城去世。本书“晚清”这一概念可基本定为1815年至1903年。有如下考虑：

(1)姚、吴去世在晚清古文进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姚鼐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建者，他的去世标志着以钟山书院为中心的古文圈子开始解散。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大师，他的去世标志着以莲池书院为中心的古文圈子接近尾声。

(2)在乾嘉考据之学居学术主流的情况下，姚鼐复兴古文的愿望难以实现。姚鼐去世后，其弟子的力量日益壮大，而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又使得古文发展很快，从事古文创作实践的人数日益增加，其中梅曾亮将桐城古文传播到京师，吴德旋将桐城古文传播到江浙，陈用光、吕璜分别将桐城古文传播到江西、广西。曾国藩则将桐城古文与湖南固有的文学传统结合起来，创立湘乡派。随着其古文思想的成熟和政治地位的上升，湘乡派古文很快传播到大江南北。曾氏弟子张裕

钊和吴汝纶以莲池书院为中心,将桐城湘乡古文传播到北方,出现了不少卓有成就的古文家。因此,晚清古文发展情况大致可看做是桐城古文由江南扩衍到全国的动态过程。与此同时,古文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桐城古文又有一个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过程。总的来看,这一时段古文现象异常集中,易于将古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事件来考察和研究,而这一过程正好在我们界定的“晚清”之内。

(3)像姚永朴、姚永概兄弟,马其昶,林纾,严复等古文家,他们活跃在五四运动前后,从时段上说,已经进入民国时期。从古文自身而言,此时古文逐渐成为研究的对象,参与时代文学建构的功能明显减弱,像林纾《春觉斋论文》、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等都是研究古文的成果。随着学部的创立,新式教育在全国蔚然兴起,古文在中小学堂教育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古文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而这些大多发生在吴汝纶去世以后。

接下来,对晚清“古文”内涵加以说明。“古文”是指晚清语境中的

古文,它既不同于现代意义上所谓的晚清散文,^①也不同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语境下与白话文相对的“文言文”,它与韩愈所创立的“古文”相同。韩愈创立的“古文”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讲文统和道统。“道统”指的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传的儒家政治理想。“文统”指的是由六经、孟子、司马迁、扬雄等相承下来的古文传承谱系。本书在厘定研究对象时主要看其是否合乎这一标准。桐城派、湘乡派是这一文统和道统的坚守者,因而这里研究的“古文”主要是指晚清桐城派和湘乡派古文,包括阳湖派。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论桐城派古文功过时,说:

平心而论,古文学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韩愈至曾国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骈文的弊病不消说了。那

① “散文”又称“美文”、“文学散文”。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文学改良观》,首次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指出“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从而规定了近代散文的文学性。周作人在1921年6月8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美文》,指出近代散文的审美性。他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他说明了古文与近代散文在文类上的共通性。王统照于1923年6月21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提出“纯散文”的概念,指出此类文章“写景写事实,以及语句的构造,布局的清显,使人自生美感”,从文章内容、语言、结构及接受者效应诸方面说明了近代散文的特点。其他像傅斯年1918年12月写成的《怎样写白话文》、王统照在1924年2月21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散文的分类》、胡梦华在1926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发表的《絮语散文》、梁实秋1928年10月10日《新月》第一卷第八号发表的《论散文》,对散文各方面进行了分析。依刘半农、周作人和王统照的观点,魏晋文章和晚明小品是散文的主流,古文家肯定不认同。如果将古文中的“序”、“记”与“说”这类文体归于散文的话,则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文钞》其他文体的文章很难说成是散文,那也不合姚、曾的原意。总之,散文概念在文体上比古文所涵盖的范围要小。在表达情理方面,散文以能否产生美感为判断的主要依据,而古文更多的是关注于“道”和其能“及物”的层面,强调其实用性。因此,现代“散文”和古文虽有交错的部分,但不是同一个概念。

些瞧不起唐宋八大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汉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没有用,只替文学界添了一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故桐城派的中兴,虽然没有什么大贡献,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他们有时自命为“卫道”的圣贤,如方东树的攻击汉学,如林纾的攻击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以载道”的话的毒,未免不知分量。但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①

胡适评论桐城派古文,是将其放在“古文学”中加以比较。应留意的是:(1)他认为“古文”是指“韩愈至曾国藩以下的古文”。在他看来,“古文学”包括骈文、古文和师法周秦、魏晋的文章。(2)胡氏这段话中“古文”一词出现四处,每处都不是泛指,而是指韩愈以降的古文,这可看做本书界定“古文”的一个例证。

郭绍虞先生认为:

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

^① 《胡适文存》第2卷,页188,黄山书社,1996。

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①

这是较为公允的看法。实际上,本书正是以后期桐城派为中心。

第二节 问题与方法

在本书中,“晚清古文”是作为晚清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来处理的,是晚清社会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包括晚清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更包括古文作为一种现象,在历史中形成的既有特性和传统对于古文家参与社会实践的影响。

一、展示晚清古文的可能世界

这一时期古文创作群体非常庞大,^②然而并未开拓出古文新境界来。和前代古文相比,晚清古文家在题材、文体、理论方面贡献不明显。韩愈发明了赠序;柳宗元有山水游记;宋代三苏以策论著名;欧阳修学习韩愈开创了新的古文笔法;曾巩有学记;归有光集中描写日常伦理琐事,借鉴《史记》的叙事方法,拓宽了古文的新境地。晚清古文沿袭前人已有的文体和题材,这与晚清社会的实际情况不相称。按理说,古文应有长足的发展,不仅在题材上,而且与此题材相应的文体亦当有所开创,但事实并不如此。像梁启超、黄遵宪等倡导新文体、“文界革命”,在新时代开创新文体,较好地表达新事物,开创了中国文章的新境界。这与韩愈那时创立“古文”,表现新的社会现象,表现人们新的情理体验,精神上是相通的。像郭嵩焘、薛福成等古文家描写异域风光的古文作品,在晚清古文创作中毕竟属于少数。这一现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页310,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② 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统计,晚清古文作家不下二百人。